

聚光灯

既是复古游轮又是演出舞台

《知音号》：开启武汉演艺“漂移”时代

在湖北武汉的长江武昌造船厂码头，停泊着一艘120米长、3层结构、黑白船体的蒸汽游轮“知音号”。今年底，这艘可容纳1008人的蒸汽复古游轮将在长江上鸣笛启航，一台演绎武汉知音故事的大戏《知音号》也将在船上上演。届时游客和市民可登上这艘“艺术方舟”，体验一场江城独有的文化穿越之旅。

□□ 本报记者 鲁娜

叮叮车叮当作响，人们鱼贯走上码头。200余米的汉口老码头上，穿梭卖报的小童、卖哈德门的小贩卖力吆喝，提皮箱戴礼帽的绅士、旗袍淑女匆忙赶船。换一张旧船票，登上这艘“知音号”游轮，就开启了“漂移式多维体验剧”《知音号》的观看之旅。这部演绎江城武汉“知音”故事的剧目，试图将观众带进一次全天候、多时空的时光之旅中。

为G20献礼的《最忆是杭州》西湖实景演出的成功，让实景演出似乎又看到了光明的前景。不过，拥有很多实景演出元素的《知音号》，并不标榜自己是一部实景演出，而是一个综合性城市文化演艺项目。这部在漂移舞台上演的创新剧目，能否在江城武汉“见到知音”呢？

一剧联动武汉两江三镇

伯牙子期这一段高山流水知音难觅的故事，伴随着长江水流淌了千百年。后人在伯牙鼓琴摔琴的武汉修建起了古琴台，追忆这一对知音。

2014年冬，《知音号》总策划、总导演樊跃第一次登上古琴台，借由知音文化，开始了其与武汉的2年“蜜月期”。樊跃告诉记者，此前他就有想法要做一台船上演出，后来“遇到”武汉，可谓一拍即合。

记者了解到，《知音号》由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投资，联合“印象”系列总导演之一的樊跃，历时2年共同打造。与传统文化演艺项目不同的是，出品方根据导演的设计，以上世纪初武汉民生公司“江华轮”为原型再造了一艘蒸汽游轮“知音号”，将演出从剧场传统舞台转移到漂移的江轮之上。演出时，“知音号”游轮将从老码头出发，一路串联起武汉的地标性地点，最终于新码头靠岸，恰是一趟穿越城市与时光的旅程。

为了重现历史风貌，“知音号”游轮从设计到打磨都极尽细致。船上所用铆钉近3万颗，均以“江华轮”原型制造；后期聘请国内优秀的电影美工团队，对外观及内饰全船做旧，就连灯饰、桌椅等物件也都是仿古造型。同时，该游轮采取全电推的方式，轮船复古烟囱采用升降式结构，确保船只可以通过长



《知音号》正在武汉紧张排练，预计今年年底公演。

江上任何桥梁，完成长江流域巡演。

武汉旅游发展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董志向介绍，《知音号》从2014年底启动，今年5月完成创作。同时，“知音号”游轮目前已完成装修并交付，专为《知音号》复建的汉口老码头也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、交通部等有关部委的批复。目前，该剧正在武汉进行紧张排练，预计今年年底公演。

樊跃介绍，《知音号》故事取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武汉，以知音文化为主题。《知音号》的故事发生在船上，然而演出和观看的过程，从上岸之前就已开始。整艘船都是戏剧上演的舞台，3层各具特色的船体空间，灯火通明的主甲板餐厅，浮晃晃的近百间客房，在这个漂浮在水上的多维空间，演员们各奔东西，观众观看追随。

踏进客房舱门，打开屋内的衣柜，选择一件符合舱内氛围的服饰替换上身，甚至化上妆，穿梭于每一间客房，在吧台休息喝杯小酒，也可以翻看船舱桌上泛黄的书信、触摸老旧的家具摆件，抬头透过舷窗，说不定会看到一个剧中人站立甲板之上演绎这里的故事。

“武汉并不缺演出，缺的是一个能够表达武汉气质的文化项目。”樊跃认为，与以往任何演艺形式不同，《知音号》打造了一座漂移的城市记忆“博物馆”。踏上这艘满载故事的“知音号”游轮观赏演出，人们将融于其中，与表演者共同完成关于城市、人生的江城故事。

一座漂移的城市记忆博物馆

“江、船、人，这之间的交互关系形

成了城。”在樊跃看来，这是武汉码头文化的核心部分。船作为载体，小则承载了江城的生活场景，大则承载了武汉身后的长江文化。

《2015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》的数据显示，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旅游现实竞争力排名中，武汉首次超越广州夺得全国第一，其发展速度、竞争力继续稳居全国榜首。此外，根据武汉市旅游局的预计，今年武汉将接待国内外游客2.5亿人次，旅游总收入达2400亿元，同比增长10%。

尽管发展迅速，武汉旅游也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之困。湖北省旅游委主任钱远坤认为，《知音号》正是一次承载江城武汉精品旅游+文化项目的发布。《知音号》项目目前已正式纳入《武汉市2016—2018年两江四岸旅游行动计划》的八大重点项目中，将成为武汉长江经济带建设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为了打造这一项目，出品方发动了一次征集武汉家庭记忆的活动，并将这些承载记忆的物件、照片、影像等安放在“知音号”的船舱中。“所有的记忆跟着船一起在江面漂流、发酵，讲述自己的故事。”樊跃表示，剧场的定义因此发生改变，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演员表演故事，而是一座城市的人在表述自己的情感。

在表现手法上，《知音号》还采用了倒叙、插叙及人景互动等电影手法。樊跃举例解释道：“好比将电影《泰坦尼克号》解构，在一个真实环境的不同地点将电影分拆、解构，在每一个规定情境

中放一块屏幕，演出那段情节。这样，《泰坦尼克号》就不再是一部观众被动观看的银幕电影，而是情节与环境相融的一种新体验。”

《知音号》也将是一张可以逸出去的武汉城市“名片”，因为，“知音号”游轮可以远赴重庆至上海段长江沿线任何一个城市。湖北旅游专家舒伯阳表示，《知音号》将增强武汉市与长江流域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，这也是对武汉流传千年的知音文化的最好诠释。

文化演艺打通城市“经脉”

文化演艺的本地化和邻里化一直是

《文化财富》：过去船是舞台上的一种媒介，在《知音号》中变成了主舞台。剧场的定义发生了改变，是否也为创新带来了困难？

樊跃：采用这样的方式，对每一个创作者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。在这艘3层的船上，观众会分成3路，3条路线之间的相互关系、游轮上下层的关系、演员和观众关系的确定，距离、表演、焦点的转移和视听如何成为焦点等，对于创排来说非常有挑战。

面对这样新鲜的方式，在创排过程中自然会进行得不顺利。但是，熟练的方式一般是比较常态的东西，陌生感反而会让我兴奋，能够让我不断创新，从而也能让观众体验一种新鲜的观看方式。同时，这种方式让观众与演出空间“观看”的关系被重新定义，演员与叙事的“表演”关系也被改写。

一个难题。为此，《知音号》借助“主客共享”的知音理念，打造了“一剧三版”和“全程服务”模式，玩出“晚上演正剧、白天有亲子、网上云剧场”的24小时立体剧场。该项目运营公司负责人解释，“一剧三版”即《知音号》正剧，基于互联网概念的“云剧场”，以及白天打造的青少年戏剧实验剧场——Q版《知音号》。

樊跃认为，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和背后的“知音”文化，有能力也能够成为一个城市经典的文化意象。把戏剧带出剧场，带进船舱，只是打破常规的开端。他希望观众真正处于戏剧深处，交互体验。无论是旅程还是戏剧，都是触

对话

《文化财富》：如果在这艘船上每个人看到的故事是不一样的，这还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吗？

樊跃：我们表述故事的方式是从线性转变为碎片化讲述。所有的情节在船上都是散落的、碎片化的，要靠观众自己去寻找、连接。这种连接带有观众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。每个人的经历、年龄、性别不同，找到故事的渠道、时间、地点自然也不一样。

当然，这部剧在一些地方也采用了统一叙事。比如，在节目的最后，我们用船作为第一人称，以一位老人的语气说：“你们都来到了知音号，你们也将要离开知音号，你们今天也许相遇，也许永远的别离。你们今天的相遇，或许也是我今后要讲的故事。我提议让每个人，无论是家人、朋友、爱人还是彼此不认识的人，彼此握手手

发感动的载体，在船上寻找的是故事，也是寻找自己。”有水有船的地方从来就不缺少故事。借江水、借船、借一次旅途，最后抵达的是观众自己的内心和记忆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《知音号》只对外公布了其公演日期、创排团队、创作理念等内容，并未透露项目整体投资、市场定位等。虽然未明确定位旅游客群，但还是能清晰地看到，《知音号》的主要客群来自旅游市场。

然而，从整个旅游演出产业来看，“八亏一平一盈利”的说法流传已广，盈利压力依然是行业难题。道路演艺产业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去年全国旅游演出新增18台，但停演剧目达46台。从投入产出来看，虽然2015年旅游演出实收票房35.7亿元，同比增长31.7%，但同时，去年仅新增的18台演出投资总额就高达40亿元，投入产出比依然失衡。在市场盈利能力整体疲软背景下，市场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项目的前途。

对此，武汉旅游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：“《知音号》有信心整合武汉经典文化走出武汉。《知音号》不仅是一台城市戏剧，我们把知音文化从水面向地面延伸，意在打通武汉的文化经脉，通过地面特色观光巴士串联黄鹤楼、码头、吉庆街、中山大道，形成全城文化呈现，同时用‘知音礼遇’标准订制的特色餐饮点、酒店客房、休闲酒吧、博物馆等，形成武汉独有的文化风景和城市的精气神。”

或相互拥抱15秒钟。”这一结尾其实就是要去确立和表达人与人之间了解的渴望，这也是多维体验区最重要的体验和情感表达。

《文化财富》：《知音号》汇聚了很多不同的体验，这种漂移式多维体验剧想展现出怎样的意象？

樊跃：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中，观众被角色化，故事与观众的生命经验产生联系，艺术与生活在观看与被观看的过程中自在转化。在“知音号”上的所有体验，是影像、戏剧、观众共同的行动，但是究其本质，仍然是一段旅行。这段旅行发生于城市身畔的江水之上。在浮动摇晃中，缓缓浸润着城市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慢慢展现出专属于武汉的城市肌理。同时，这段旅行也关乎人生。上船和下船，仿佛是对人生的绝妙隐喻。

创意学堂

看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格局融合之术

经济因素一旦进入城市，如果应对不好，就造成整个城市空间秩序的混乱。但中国古代城市都在极力地维护其人文空间秩序，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破坏和削弱原有的人文空间秩序。

□□ 王树声

中国虽有“重农抑商”的文化传统，但事实上，商业活动一直在发展壮大，到了明清时期，更是出现了晋商、徽商两大商帮。商业活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，并突破了以往“君子耻为邻”的偏见，商人的地位大大提高。

此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也在思考这些社会问题，经济发展之后，中国文化要如何提供新的价值标准，促进社会的繁荣与进步？王阳明无疑是最杰出的一位，他提出“四民异业而同道”的观点。这一观点也对城市规划与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随着商业的发展，相当一部分商贸活动涌入城市，人口随之增长，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，整个城市格局也会发生不小的变化。

从《图典》中所见，不少城市随着商业的发展，市镇的扩大而不断发展原来的人文空间秩序，生长成为新的城市人文空间格局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城市规划适应经济发展的一大智慧和贡献，对当今城市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例如，苏州、杭州乃是富庶之地，历史上一直是经济繁盛之区，明清两代更是进一步繁荣，但城市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而与自然山水的关系，破坏原有城市的结构，依然能遵循自然脉络和人文精神，处理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。这从《姑苏繁华图》、《南巡苏州虎丘行宫图》中即可直观其义。正是如此，才有了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美誉。这是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十分宝贵的传统，值得当今城市借鉴。

事实上，全国不少其他城市也都有

这方面的经验，例如湖南省湘潭县和河南省光山县就是典型的案例。

湖南湘潭号称“全楚之繁区”。历史记载，自明万历四年(1570年)建新城至清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近200余年的发展，城市急剧扩张。从乾隆二十一年(1756年)所绘《湘潭城总全图》可以看出，旧城和新区形态分明，新区沿湘江向西十余里，街道3层，浩浩荡荡。

新区发展改变了原有城市的形态，严整、围合的旧城与分散、开敞的新区相融合，南北山峦呼应，湘水中流，临江建筑以吊脚楼形式营建，以适应江岸地理条件，既节约了土地，也形成湘江沿岸丰富的地域建筑景致。东西十余里庙宇街衢纵横交错，商贾居民熙熙攘攘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湘潭人居长卷。

清代乾隆时期河南省光山县，由于经济的繁荣，城市向南拓展，在南门外形成南关，也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新区，为光山最为繁华的商业区。从乾隆时期街市图可以清晰看出，南关新区街巷密集，财神庙几乎成为新区的

中心，当年商业繁华场景自不必说。从南关新区的整体布局而言，它延续了与老城的关系，通过文德门与平桥这段街市，延续了老城的轴线，使新城旧城形成一个新的整体。新轴出平桥再至遇仙桥，直至大观楼而与官渡河融为一体。大观楼俗称望水楼，从街市图便能看出大观楼正处在轴线南端，临官渡河，成为滨河一大胜景，登楼山河城池即在目中。

历史上也有一些城市，随着城市发展，城外日渐聚集街市，后因安全防护之需，筑城墙维护，形成双城模式，但仍重视两城之间的空间秩序与文化景观营造，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景象。

江西的大庾县、崇仁县就是典型的例子，南北双城，一曰官城，系因礼乐而建，格局严整；一曰民城，因日用生活及贸易所需而建，格局相对自由。大庾县以“横浦桥”连接南北两城，崇仁县则以宝水为界，分南北两城，北为官城，南

为民城。“两城烟绕”为崇仁十二景之一。

经济繁荣带来城市的发展，但商业并不是城市人居的全部。中国城市有一可贵之处，就是无论何时何地，都有一种“人”的意识，思考人的问题。

湖北汉口原为小镇，到明末清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通都大邑。随着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，城市文化凝聚力削弱，文化志向淡漠。于是，徽州商人集聚地区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因此在重要地段修建了紫阳书院，祀朱熹，兼有教育与会馆的功能，成为凝聚徽商地方精神的场所。紫阳书院因经济发展、人口增加带来的新问题而修建的，可以说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的一种城市功能自觉完善。

与此相通的还有上述光山县新区，除了密集的店铺外，其街市图上还标注了恩荣坊、世显坊、古塔、三教堂、岳王庙、观音阁、朝阳寺等重要的人文建筑，虽然是一个商业交流而形成的新区，依然有其文化理想的向往，有其人文环境建设的成就。

因此，人居环境建设是综合而复杂的，不论是因商贸而形成的新区，还是历史形成的旧区，只要有人存在，就有人人的生活与理想，不能忽视城市人文环境的营造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整体的功能完善，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环境保护、社会管理、风景营造、安全防御等各个方面。

同时，经济发展必然加快古代城市建设速度，这一过程中，在对城市人文空间秩序的传承与发展方面，文人士大夫发挥了关键作用。文人士大夫不仅是城市人文空间格局的设计者、实践者，还是维护者、传承者。他们以“守道”的精神，捍卫城市的人文空间秩序，并以他们的社会威望影响社会各界共同参与这个秩序的守护，成为一方人心的共同价值。城市规划正是有了这个“共同价值”，才会任何情况下，永葆中国精神。

(节选自《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》，有删减，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)